

明代徽商與戲曲關係之研究

柯香君*

摘 要

明代中葉，商業經濟繁盛，新興商幫勢力，成為主導明代戲曲走向之重要群體組織。以鹽致富之徽商，在快速累積財富後，並感染江南一帶奢靡風氣，蓄養家樂成為徽商展現雄厚勢力及附庸風雅之媒介。而在「賈而好儒」之心裡影響下，為融入上層文人士夫之群體，「家樂」進一步成為了提高社會地位之手段，而其家樂多以演唱當時盛極一時之崑腔為主，也因而對明代崑山腔之流播，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

「商路即戲路」，明代繁盛的各地聲腔，正是隨著商人足跡而得以傳唱各地。除崑腔受到外地徽商家樂廣為流傳外，由徽商所帶回家鄉之弋陽腔，則在徽州當地演變而成新式聲腔—青陽腔及徽州腔，並且快速地隨著徽商足跡而輾轉流傳各地，終至晚明大放異彩。直至入清，更取代崑山腔，贏得「天下南北時尚徽池雅調」之美稱。徽池雅調之盛行，不僅豐富了中國戲曲世界，更見證了徽州商人的雄厚勢力及其對於戲曲之貢獻。

本文主要從明代新起之商幫—徽商為論述對象，透過徽商所帶來的經濟效益、娛樂取向及文化背景，了解徽商對於明代戲曲所產生之重要影響，不僅是戲曲活動之推進，更是聲腔劇種之流播者。

關鍵詞：徽商、家樂、徽州腔、青陽腔、徽池雅調。

* 東吳大學中文系兼任講師。

壹、前言

明代社會經濟繁榮，明初之際，雖曾一度受到「重農抑商」政策影響，導致自宋以來之富庶景象短暫逝去，然自中葉後，原本以農立國之封建體制，逐漸以商業為經濟主流，且因資本主義滲透，使商人地位抬高，不論是統治者或社會群眾，皆已逐漸體認商業之重要性。明代張居正（1525-1582）在〈贈水部周漢浦權竣還朝序〉中云：

古之為國者，使商通有無，農力本穡。商不得通有無以利農，則農病；農不得力本穡以資商，則商病。故農商之勢，常若權衡，然至于病，迺無以濟也。……故余以為欲物力不屈，則莫若省徵發，以厚農而資商；欲民用不困，則莫若輕關市，以厚商而利農。¹

明確指出商農間存在的互助互利。然而真正吸引人民棄農經商之因素，則不得不歸結於商業豐厚之利潤。明代詩人王隧於〈商賈行〉一詩中，便清楚描述了揚州當地之經商概況。

揚州橋南有賈客，船中居處無家宅。生涯常在風波間，名姓不登鄉吏籍。前年射利向蠻方，往行平販越海洋。歸來載貨不知數，黃金遶身帛滿箱。小婦長干士中女，能舞拓枝謔白苧。生男學語未成音，已教數錢懷弄楮。陌頭車輪聲格格，畊夫賣牛買商舶。²

眼見揚州賈客海外貿易，滿載而歸，當時所生之男孩，還未學會說話，便先教導如何算錢。以地域查看，明初之際，行商作賈之風氣已於揚州一帶蔚為成風。而至明中葉，許多士大夫亦對商業價值給予肯定態度，如著名思想家王陽明曾云：「四民異業而同道」³，何心隱亦提出：「商賈大於農工」，徽商子弟汪道昆亦言：「良賈何負閎儒」⁴，而明末王徵則提出：「商人者，財用發生根本也，故

¹ 明·張居正：《張文忠公全集·文集八》，收錄於王雲五編《國學基本叢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68年12月），頁262。

² 明·王隧：《青城山人集·七言古詩》，收錄於《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冊176，（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年），頁31。

³ 明·王陽明：《王陽明全集》卷25〈外集七·節庵方公墓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頁941。

⁴ 明·汪道昆：《太函集》，（合肥：黃山書社，2004年12月）。卷55〈誥贈奉直大夫戶部員外郎程氏公暨贈宜人閔氏合葬墓誌銘〉「大江以南，新都以文物著。其俗不儒則賈，相代若踐更。要之，良賈何負閎儒，則其躬行彰彰矣！」，頁1146。

欲求裕國，必先恤商。」面對經濟昌榮，這些士夫階層，終於慢慢體認到商賈對於國家社會之重要性，而不再以輕視態度面對。

朝中政策已無法遏止商業發展，商業帶給國家之助利已無法被抹滅，因此，除了受到文人士夫肯定外，許多商人自身亦不再視經商為可恥之事，反而頗感自豪。明人李維禎記載了陝西商人王來聘告誡子孫：「四民（士商農工）之業，惟士為尊，然無成則不若農賈。」⁵若士不成，則不如業賈。可知商人地位於明代已然逐漸擡升，尤其在商人匯集，經濟富庶之地，更是如此。如揚州地方匯集了來自各地鹽商，「揚州江都，俗喜商賈，不事農業。」⁶在商業繁盛及商人聚集之處，商人地位普遍較為崇高。而本身就經商為業的地區，亦是如此，如以徽州當地言：「商居四民之末，徽殊不然。歙之業齟於淮南北者，多縉紳巨族。」⁷徽商乃明代重要商幫群體，因此徽州人民對於商人並未加以輕視鄙薄，反倒是讚賞有加。而同屬明代重要商幫之山西商人王文顯則認為：「士商與士，異術而同心。故善商者，處財貨之場而修高明之行，是故雖利而不汙善士者。」⁸善經商者與士子，不過是異術而同心。

商人在明代經濟起飛後，已逐漸獲得社會認同，不僅商賈自身肯定自己，士大夫亦體認商業之重要價值。商業成為明代社會經濟新主流，不但豐富了明代經濟狀況，也帶動了社會文化新風氣。

明代商人興起產生地域化之現象，各商幫集結同鄉經商者形成龐大的商業團體，不但藉由鄉土情誼以增強商幫勢力，更企望從中求取最大的經濟效益。在明代新興商幫勢力中，山西商人與安徽商人堪為主要代表。謝肇淛於《五雜俎》卷四便云：「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江北則推山右。」⁹雄據一南一北的徽商與晉商，正式於明代發光發熱，他們不僅為其家鄉帶回豐厚的財物，同時帶動了明代社會經濟的發達，更重要的是伴隨商路的出現，促進了中國文化藝術交流，產生「商路即戲路」的戲曲盛況。

一個商幫形成，包含著諸多因素，本文首先從內在層面切入，針對明代蘊釀徽商崛起之地緣因素做一基本了解，並根據徽商本身特質及風俗信仰，以分析探究徽商與明代戲曲間之關係；最後，從其經商路線，了解徽商對於當時聲腔流播之影響。藉由各各層面，了解有明一代新興商幫對明代戲曲發展之貢獻。

⁵ 明·李維禎：《大泌山房集》卷 106〈鄉祭酒王公墓表〉，收錄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冊 153，（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年 6 月），頁 154。

⁶ 明·楊洵：萬曆《揚州府志》，收錄於清·陳夢雷編：《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 760〈揚州府部風俗考〉，（臺北：鼎文書局），頁 154。

⁷ 許承堯：《歙事間譚》（下）第 18 冊〈歙風俗禮教考〉，（合肥：黃山書社，2001 年 5 月），頁 603。

⁸ 明·李夢陽：《空同集·明故王文顯墓志銘》，收錄於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八集，（臺北：商務印書館，1974 年），頁 4。

⁹ 明·謝肇淛：《五雜俎》，收錄於《續修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冊 113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頁 412。

貳、明代徽商之崛起

徽商，在明代經濟逐漸繁盛之下，首先掌握到商業先機。除了受到內在地理因素影響，以致人口外出經商外，後續的經商活動、營運商品，更是促成徽商勢力迅速壯大的重要推手。

一、山多田少、人稠糧缺

徽州位於皖南丘陵山地，地理形勢封閉，「東有大鄣山之固，西有浙嶺之塞，南有江灘之險，北有黃山之阨」¹⁰，崇山峻嶺對峙，其間則有新安江、龍田河等水系流入錢塘，而婺江、閩江水系則匯入鄱陽湖，整體形成山環水繞、山嶺川谷崎嶇之地形，相對的可耕地自然不是非常充裕，正是「八山半水半分田，一分道路和莊園」。顧炎武於《天下郡國利病書》第九冊云：

徽郡保界山谷，土田依原麓，田瘠貧，所產至薄……不宜稻粱。壯夫健牛，……視它郡農力過倍，而所入不當其半。有田皆仰高水，故豐年甚少，大都計一歲所入，不能支什之一。……以故中家而下，皆無田可業。徽人多商賈，蓋其勢然也。

四面環山的自然屏障，封閉徽州對外的陸上交通，因此歷代許多戰事均未波及徽州一地，於是徽州自然成為中原士民南下遷徙的最佳地點，也因而造成徽州人口不斷成長，終於演變成「人稠糧缺」的情況。¹¹

山多田少、人口日增是徽商出賣的主要內緣因素。據史料記載統計，自南宋到元代，徽州人口由 50 萬增加到 82 萬，而明清時期亦陸續增加。人口驟增，使得徽州人民生活面臨糧食短缺之窘境，因而迫使徽州人走向經商謀生的道路。姚邦藻於《徽州學概論》中，指出了徽商崛起的三大因素：

- 一、與日俱增的人口和山多地少的客觀環境壓力。
- 二、豐富的物產、便捷的水路交通刺激徽人經商。
- 三、徽人思變精神的內在動力加上當時我國經濟重心南移的外部契機。¹²

¹⁰ 道光《徽州府志》卷二之二〈地輿志·形勝〉，收錄於《中國地方志集成》冊 235，（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年），頁 137。

¹¹ 明·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 61〈贈程君五十敘〉，收錄於《明代論著叢刊》，（臺北：偉文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76 年 5 月），頁 3017。「新安僻居山谿中土，地狹民人眾，世不中兵革，故其齒日益繁，地瘠薄，不給於耕，故其俗纖儉習事。大抵徽俗，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其所蓄聚，則十一在內，十九在外。」

徽人出賈風氣，大約始於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時期。¹³一旦經商謀生之路打開後，徽人便蜂擁而出，明人王世貞曾說：「大抵徽俗，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¹⁴可知，明代徽州人民絕大部分在外經商，明人張翰《松窗夢語·卷四·商賈紀》亦言：

自安、太至宣、徽，其民多仰機利，舍本逐末，唱權轉穀，以遊帝王之所都，而握其奇贏。休、歙尤夥，故賈人幾遍天下。良賈近市利數倍，次倍之，最下無能者逐什一之利。¹⁵

明代徽州休、歙縣之商人，幾乎遍佈天下。而就地理位置言，明初開中法的實施，開展了邊防商機，徽商雖曾參與，但礙於地理環境限制，終究無法壯大徽商氣勢。直至明中葉，改良舊制以折色銀代米糧，才使徽商成功地獲取兩淮、江浙鹽引。此外，明代吳中、南京一帶，經濟昌盛，是南北商賈爭赴之地，而鄰近的徽商亦因地緣關係，很快的便取得江南商業掌控權，終於在明代成爲江南最大的商業組織。

二、以鹽致富、雄霸江南

明代洪武三年（1370）年的「開中法」施行，¹⁶可說是明代商幫興起的主要契機。明朝自蒙古手中奪回政權後，爲徹底消滅蒙古及周邊外患，依然於邊境駐守了數十萬軍隊，東起遼陽，西至甘肅，設立九個邊防。爲了解決邊防部隊龐大的糧餉問題，明代政府不得已只好釋放出食鹽銷售權，鼓勵商人將物資運送至邊關防守之地，以充實軍糧儲備。¹⁷依據《正德會典·卷三十六·鹽法·事例》記

¹² 姚邦藻主編：《徽州學概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12月），頁76-77。

¹³ 張海鵬、王廷元主編：《徽商研究》，（合肥：安徽出版社，1995年12月），頁5。

¹⁴ 明·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61，〈贈程君五十敘〉，收錄於《明代論著叢刊》，頁3017。

¹⁵ 明·張翰：《松窗夢語》，收錄於《歷代史料筆記叢刊·元明史料筆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5月），頁83。

¹⁶ 黃鑒暉：《明清山西商人研究》，（太原：山西經濟出版社，2002年6月），頁30。「洪武三年，山西行省請准令商人納糧中鹽後，洪武四年（1371），定全國中鹽例，大同等14個倉，按道路遠近，每引鹽納糧5斗至1石有差，開中制推行開來。」

¹⁷ 明·于慎行：《穀山筆塵》，收錄於《歷代史料筆記叢刊·元明史料筆記》，（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6月），頁140。「今九邊坐派錢糧，舊有定數，大約宣府八十三萬餘兩，大同七十七萬餘兩，遼東三十八萬餘兩，延綏二十八萬餘兩，寧夏二十二萬餘兩，甘肅三十八萬餘兩，六邊共計三百七萬有奇。俱山、陝、河南、山東、北直并本鎮屯田糧草解納。已而歲用不敷，每年議發年例并開派兩淮、山東、兩浙、長蘆引鹽，宣府一十九萬餘兩，遼東二十萬兩，延綏九萬兩，寧夏十六萬餘兩，六邊共計九十一萬，此其大略也。」

載，所謂「開中法」，就是商人將軍需物品運送到邊防指定地點後，由官府發給商人收到貨物的證明倉券，商人再依據倉券到指定的都轉運鹽運使司或鹽課提舉司換取鹽引（即賣鹽許可證），而後商人持鹽引領鹽，至各鹽行銷區販賣獲利。如洪武四年（1371）所制定的中鹽例¹⁸，根據送貨里程遠近，一至五石糧食可向政府換取一小引（二百斤）鹽引。鹽，於人民生活中極為重要，張翰《松窗夢語·卷四·商賈》中提及：

茶鹽之利尤鉅，非鉅商賈不能任。第市法有禁，西北在茶，東南在鹽。茶禁通於西北之虜，而多產於東南，故其法久而可守。鹽禁限於行鹽之地，而在在有之，故其法拘而難行。且茶利食於人，權於國者，什之一二；鹽利食於人，權於國者，什居七八。¹⁹

可知鹽利更甚於茶利，營利稅收達十之七八，因而促使商賈爭相取利，成為明代各地商幫興起主要營運之對象。

開中法實施後，促使商人趨之若鶩，其中鄰近邊防之山西商人，便是在佔有地理優勢之情況下，迅速發展。就在山西商人大發利市後，原本活動於江浙一帶的安徽商人，亦起而效之，挾資北上，也因此擴大了徽商的經營範圍。然而安徽商人並無晉商有著地理環境之優勢，徽州距離邊塞太過遙遠，納糧鹽引終究敵不過山陝商人的競爭，也因此早期並無太多徽商加入此一行列。所幸至明憲宗成化年間，停止了各邊防之開中法，令鹽商於戶部或運司納糧換取鹽引，已無需親自運送糧餉至邊防。而等到明孝宗弘治（1488-1505）時，為增加國庫收入，於是更改舊制，以折色銀代替米納糧，每鹽引輸銀三、四錢不等。明人陳洪謨（1474-1496）於《繼世紀聞》卷之二云：

蓋洪武、永樂以來，天下鹽課俱開中各邊，上納本色米豆，商人欲求鹽利，預於近邊轉運本色，以待開鹽報中，故邊方粟豆無甚貴之時。今廢商人赴邊報中之法，雖曰得價多，而近邊米豆無人運買，遂致騰湧。²⁰

¹⁸ 「中鹽」，即所謂開中法。

¹⁹ 明·張翰：《松窗夢語》，收錄於《歷代史料筆記叢刊·元明史料筆記》，頁 85。

²⁰ 明·陳洪謨：《繼世紀聞》，收錄於《歷代史料筆記叢刊·元明史料筆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 5 月），頁 83。

商人爲求鹽利，不惜遠赴邊防，然而等到開中法變調，以銀代米後，雖然國庫收入增加，但卻反而產生邊防米豆不足的現象²¹，不過也因此造成徽商勢力迅速擴展。

民以食爲天，運販糧食雖是許多商幫興起時主要營運商品，但能迅速致富者，則以經營鹽業爲主，有不少商人因此而貲數鉅萬。在開中法逐漸廢弛後，原本由山陝商人所掌控之鹽引商機，便逐漸過渡到徽商手中。沒有了地理距離限制後，徽商開始大發鹽財，經營鹽業者愈來愈多，當時主要以兩淮鹽場產鹽量最多，對於原本就以江浙爲經商地域之徽商而言，更是如魚得水。因而在徽商營運商品中，主要以鹽商最爲富甲天下。明人謝肇淛於《五雜俎·卷四》中云：「新安大賈，魚鹽爲業，藏強有至百萬者，其它三十萬，則中貫耳。」²²明代整個兩淮鹽業，幾乎爲徽商所壟斷，特別是徽州歙縣商人，萬曆《歙志》卷十〈貨殖五〉載：「邑之以鹽筴祭酒而甲天下者，初則有黃氏，後則汪氏、吳氏相遞而起，皆由數十萬，以汰百萬者。」²³而徽人亦常言：「吾鄉賈者，首魚鹽，次布帛。」²⁴如汪宗孝、汪汝謙等，皆爲明代兩淮重要鹽商。此外，因爲江浙、兩淮鹽業興盛，也吸引了晉商遠離邊防故土，來到江南營生，但其勢力卻始終不敵徽商。然而山西商人並不服輸，很快的便轉向取得長蘆、河東鹽之控制權，²⁵與陝西商人四川井鹽，形成三足鼎立之情況。可知，隨著政治律令的變動，各個商幫間之經營範圍亦由北到南，且呈現出勢力互相消長之情形，最終成就了繁華富庶之江南。

徽商除了依靠江浙、兩淮鹽引致富外，亦利用徽州本地所擁有之豐富物產作爲營運商品，其中又以茶、木、質鋪三者爲大宗。首先是丘陵地形所栽種之茶葉。徽州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重要的產茶地區，南唐時劉津就曾經說過：「婺源、浮梁、祁門、德興四縣茶貨多。」²⁶至明代，飲茶已成爲人民生活中的一部分，各地更是茶坊、茶樓林立，因此茶葉需求量日增，使得徽州茶葉成爲徽商外銷的重要商品。「歙之巨商，業鹽而外，惟茶北達燕京，南極廣粵，獲利頗賒。」²⁷其營運範圍可說從南到北，獲利豐碩。張海鵬、王廷元於《徽商研究》中指出：

²¹ 明·陳洪謨：《治世餘聞》佚文一則，收錄於《歷代史料筆記叢刊·元明史料筆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5月），頁119「（弘治）鹽法尤重，今已壞盡。各邊開中，徒有其名，商人無利，皆不肯上納。」

²² 明·謝肇淛：《五雜俎》，收錄於《續修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冊1130，頁412。

²³ 萬曆《歙縣志》，明萬曆三十七年刊本。無頁碼。

²⁴ 劉建生、劉鵬生：《晉商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頁333。

²⁵ 黃鑒暉：《明清山西商人研究》，頁5-6。「隨著河東鹽產量的增加和行銷區域的擴大，無疑也把山西商人推向外省及省內各地。……至明末清初，河東鹽行銷區爲山西、陝西、河南三省相鄰的173個州縣。」

²⁶ 南唐·劉津：《婺源諸縣都置新城記》，收錄於《婺源縣志》卷59〈藝文〉三。轉引自唐力行：《明清以來徽州區域社會經濟研究》，（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1999年8月），頁159。

²⁷ 許承堯：《歙事閒譚》（下）第18冊〈歙風俗禮教考〉，頁603。

茶葉貿易在明清成化、弘治年間到道光中葉的數百年間，得以成為徽州商幫四大貿易活動之一的的原因，並不僅止於貨源充裕與市場開拓兩項。茶葉營銷利潤的豐厚、徽州茶商嚴密的採辦、加工、運輸、銷售體系等等、也是茶葉成為徽州商幫「大宗」貿易的重要因素。²⁸

徽商茶葉貿易，自明代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便已開始，而其豐厚利潤，著實為徽商帶來豐厚財富。

木材業在徽商貿易中亦佔有重要地位。徽州地處於皖南山地丘陵區，雖不宜農作物生長，但卻有著豐富的木材資源，其中又屬婺源林木蘊藏量最大。

徽多木商，販自川廣，集於江寧之上河，資本非巨萬不可，因有移家上河者，服食華侈，仿佛淮揚，居然巨室，然皆婺源人。²⁹

木材獲利亦頗為可觀，使得婺源人同淮揚鹽商一般，服食奢侈。木材主要用於建造房屋、車船、以及生活工具、家具等，在人民生活中極為重要，明中葉後，徽州木商開始發展起來，主要以江南地區為集散地，東走浙江淳、遂、衢、處，南下閩、廣，北上河套，還溯長江西行，遠涉江西、湖廣、四川、貴州等，³⁰足跡遍佈各個木材的重要產區，是徽商四大行業中最晚衰落的。

此外，明代徽商對於典當業亦是不遺餘力，尤其是休寧人。「典商大都休寧人，……治典者，亦惟休稱能，凡典肆無不有休人者，以業專易精也。」³¹徽商典鋪分布極廣，不但壟斷江南蘇浙一帶典當業，並擴展至在北方，如明末徽商汪箕，於北京開設典當鋪，「家資數百萬，典鋪數十處。」³²其餘如山東、湖廣、江西、閩、粵各省，亦有徽商典當業之足跡。許多徽商都是在累積巨大財富後，才改行典當業，從事放高利以圖更大財富。

徽商步入中國商業舞臺大致於元代末年，至明中葉活動範圍逐漸擴大，成為當時最重要的商業組織。明代徽商之所以能夠迅速壯大，在於掌握了重要的商業契機，不論是鹽業、棉布、木材、還是典當業，都是獲利巨大的行業，而其在徽商的營運手中，不但成功的銷往南北各地，使得徽商足跡遍佈全國，也因此徽州家鄉的風俗文化亦流傳至各地，著實對明代社會文化環境有著重要的影響力。

²⁸ 張海鵬、王廷元主編：《徽商研究》，頁 225。

²⁹ 許承堯：《歙事間譚》（下）第 18 冊〈歙風俗禮教考〉，頁 604。

³⁰ 唐力行：《明清以來徽州區域社會經濟研究》，頁 175。

³¹ 許承堯：《歙事間譚》（下）第 18 冊〈歙風俗禮教考〉，頁 604。

³² 明·計六奇：《明季北略·富戶汪箕》卷 23，收錄於王雲五編：《人人文庫》，（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年 5 月），頁 509。

參、徽商之特質與信仰習俗

不同地域具有不同的風俗信仰與特質，能夠成為明代首屈一指之徽商，也擁有著不同其他商幫之特性。受到徽州當地環境、習俗之影響，一方面不但建立了徽商在外經商重要的信譽，另一方面則因徽商輾轉於各地謀生，促使家鄉習俗得以傳播於外。

一、賈而好儒、朱子為尊

徽商能夠於明代稱雄商界，與其「賈而好儒」之特質息息相關。徽州素有「文獻之邦」、「禮讓之國」的美稱，而徽州人民自來便深受中國儒家思想道德的影響，也因此徽州商人亦崇儒、重儒。許多徽商在經營活動中，便是以儒術建立起商業道德，以「誠意立信」、「重義輕財」做為經商手段。汪道昆於《太函集》中云：

新都（徽州）三賈一儒，要之文獻，國也。夫賈為厚利，儒為名高，夫人畢事儒不效，則弛儒而張賈；既則身饗其利矣。及為子孫計，寧弛賈而張儒。一弛一張，迭相為用，不萬鍾則千駟，猶之轉轂相巡，豈其單厚然乎哉！³³

明確分析「張儒」、「張賈」各自因素所在，二者是迭相為用，若事儒成效不果，則張賈；若為子孫著想，則張儒。姚邦藻於《徽州學概論》中指出徽商賈而好儒的原因：

- 1、徽商所在的地區是一個有著深厚文化積澱的地區。
- 2、為了獲得與經濟地位相稱的社會地位需要以「儒」為外衣來包裝自己。³⁴

可知，徽人賈而好儒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徽商勢力的發展。雖然明代商業興盛，商人地位有擡升趨勢，但於傳統觀念中，商人始終無法進入中國根深柢固的封建思想體系裡，因此許多徽商在累積一定財富後，所考慮的便是如何獲得權勢，以提升社會地位。如明萬曆年間（1573-1620）鮑柏庭，依據歙縣《新館鮑氏著存堂宗譜·卷二·鮑柏庭傳》所載：「世居歙東新館，……家初以貧，奉養未能隆，

³³ 明·汪道昆：《太函集》卷52〈海陽處士仲翁配戴氏合葬墓志銘〉，收錄於《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冊134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390。

³⁴ 姚邦藻：《徽州學概論》，頁85。

後以業浙鹺，家頗饒裕，……其教子也以義方，延名師購書籍不惜多金。曾云：『富而教不可緩也，徒積資財何益乎。』³⁵在成爲富商後，柏庭不惜花費重金請名師、購書籍來教子，充份表現了徽商好儒之特質。此外，徽商亦熱心助修書院。「明代，徽州書院勃興，到了清初，徽屬六縣計有書院五十四所。」³⁶就現實層面來看，徽商「賈而好儒」背後的主要目的，在於提高自身社會地位，而身份地位的提高，則有利於徽商商業活動的開展，許多徽商便是善用儒學而受到官府特別寵遇。

此外，賈而好儒也進一步使徽商內部宗族凝聚力更爲緊密。據嘉靖《徽州府志》卷二〈風俗志〉記載：「家多故舊，自唐宋來數百年世系比比皆是。重宗儀，講世好、上下、六親之施。村落家構祠宇，歲時俎豆其間。」³⁷而吳子玉於〈沙溪凌氏祠堂記〉亦提及：「寰海之廣，大江之南宗祠無慮以億數記，徽最盛；郡縣道宗祠無慮千數，歙最盛。」³⁸可知，自唐宋以來，徽州一帶宗族體制便已相當興盛。清代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卷十一亦云：

父老嘗謂新安有數十種風俗，勝於他邑，千年之塚，不動一抔；千丁之族，未嘗散處；千載譜系，絲毫不紊；主僕之嚴，數十世不改，而宵小不敢肆焉。³⁹

徽人宗族觀念所以勝於他邑，主要是受到儒風影響，並與南宋朱子關係密切。朱子所制訂之《家禮》，是徽州各族家典、族規藍本，不但深深影響每個徽州人民的思想行爲，並供奉於宗祠內加以祭祀。趙吉士云：「歲時伏臘，一姓村中千丁皆集，祭用文公家禮，彬彬合度。」⁴⁰朱子，江西婺源人，婺源一地明代時隸屬於徽州。本著同鄉情誼，朱子成爲徽州一地人民禮敬對象，不僅於徽州本地宗祠供奉，且進一步成爲新興商業會館之崇拜對象。雖然明代未見有徽商會館建築資料，但就清代資料記載，亦可推知一二。在《徽商公所征信錄·序》中云：「浙之侯潮門外徽國公文公祠，即徽商木業公所。」而於〈凡例〉中規定：「每年九

³⁵ 歙縣：《新館鮑氏著存堂宗譜·卷二·鮑柏庭傳》，轉引自唐力行：《明清以來徽州區域社會經濟研究》，頁 88。

³⁶ 張海鵬、王廷元主編：《徽商研究》，頁 386。

³⁷ 嘉靖《徽州府志》，收錄於《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29·史部·地理類，（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6 年），頁 67。

³⁸ 明·吳子玉：《大鄣山人集》卷 22，收錄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冊 141，（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年），頁 511。

³⁹ 清·趙吉士：《寄園寄所寄》，收錄於《續修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冊 119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頁 127。

⁴⁰ 清·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卷 11〈故老雜記〉，收錄於《續修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冊 1197，頁 127。

月十五日乃先賢朱子生辰，公所當辦香燭貢獻，虔忱禮拜。」⁴¹經商在外的徽商，為維持凝聚彼此間的內部秩序與力量，便以家鄉的宗法思想做為武器，因此清代各地徽商會館、公所亦兼為「文公祠」。

二、信仰祭祀、戲曲活動

宗族建立祠堂的首要目的為祭祖，藉此與祖先精神溝通，乞求祖上庇佑宗族順遂，達到敬宗受族之效。徽州一地盛行建立祠堂，明萬曆間《祁門縣志·卷四·風俗》云：「宗誼甚篤，家有祠，歲時俎豆，燕好不廢。」祠堂中祭祀活動，則是宗族大事，起著凝聚鞏固宗族組織的力量。依照宗觀念制度，祭祖是神聖且嚴肅之事。如萬曆抄本《茗州吳氏家紀》卷七記載：「吾族喜搬演戲文，不免時屆（絀）舉贏，誠為糜費。」⁴²作為族規，此家族反對搬演戲文，不過也正好反證徽州演戲之盛。

徽州一地，宗族繁盛，而談到徽州戲曲，必得提及「目連戲」。目連故事在中國民間流傳已久，內容融涉了儒釋道三家思想體系，其中又以儒家孝道為主軸，此劇深具濃厚的中國文化色彩。而至萬曆年間，祁門縣清溪鄭之珍寫定《目連救母勸善戲文》後，徽州鄉間便紛紛建立起目連戲班，尤以清溪、栗木兩地最為盛行，有「編在清溪，打在目連」的說法。據鄭存孝於《鄭之珍目連戲在清溪》一文中指出，該村保存了鄭氏宗祠敘倫堂，堂上有一副對聯：「目連記演不盡奇觀迪吉避允可當春秋全部」，「高石公具如斯卓見勸善懲惡何如講演十篇」，而該村演目連戲的場地即是在宗祠內進行。

目連戲本於徽州一地就已相當盛行，並且流傳在外，張岱於《陶庵夢憶》一文中記載了徽州、旌陽戲子搬演目連，三天三夜。就徽州族規而言，主要崇奉《朱子家禮》，而程朱理學所強調的是封建倫理道德，所彰揚的是忠孝節義的倫理綱常，如安徽歙縣澤富王氏，其《宗規》載明隆慶六年（1572）刻本《歙澤富王氏會通宗譜》，卷云八：「為子者必孝順奉親，為父者必慈祥而教子，為兄弟者必以友愛篤手足之情，為夫婦者必以恭敬盡賓對之禮。」⁴³因此，目連戲於宗祠演出，既符合宗族規定，亦達到教化族人之目的。

此外，當地寺廟迎神賽會，宗祠亦加入參與行列。如流傳於徽州黃山區必吉嶺之五福神會。據清嘉慶《太平縣志》記載，當地五福廟建於元朝末年。五福神會於每年農曆八月十四、十五舉行，活動經費則由村落中兩個宗祠分別負擔，活動主要分為降神與路巡兩部分。十四日先行降神儀式，而後列隊沿村巡演，包括

⁴¹ 《徽商公所征信錄》，轉引自唐力行：《明清以來徽州區域社會經濟研究》，頁 184。

⁴² 萬曆抄本《茗州吳氏家紀》，轉引自朱萬曙：《徽州戲曲》，（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 年 5 月），頁 7。

⁴³ 明隆慶六年（1572）刻本《歙澤富王氏會通宗譜》，轉引自常建華：《明代宗族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 2 月），頁 319。

有判官、和合、七星、土地、正神五郎、四郎、三郎、二郎、一郎等眾神，當晚諸神於當值宗祠內停留看戲過夜，隔天繼續路巡，而後回到五神廟退神，結束活動。⁴⁴當地蘇氏宗族分居於必吉嶺上下兩村落，可謂同屬一家人，因此五神廟會舉行不僅是村里大事，亦為宗族內重要活動，其間不但有完備的祭神儀式，而祠堂內之戲劇演出則帶有娛神亦娛人之性質。

肆、徽商與家樂

徽商素稱「徽駱駝」，其經商能力創造出「無徽不成鎮」之業績，興起於元末之徽商，至明中葉開始活躍於商業舞臺。明代安徽商人遍佈各地，理應建有一定數量之會館，但考察現今存留資料，卻無發現。此外，徽州人民喜愛搭臺看戲。明萬曆間，歙縣縣令傅岩曾說：「徽俗最喜搭臺看戲。」而清代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卷十一〈故老雜記〉提到：「先祖日記，萬曆二十七年休寧迎春，共臺戲一百零九座。」⁴⁵隔年萬曆二十八年（1600），則於徽城舉行迎春賽會活動，共搭戲臺 36 座，聚集了來自各地之戲班，是一次盛大的戲曲集會活動。搭臺看戲的熱鬧景象，充份表明徽商對於戲曲之喜好。在筆者考述下發現，徽商於各地所興建的是宗祠、是新市鎮，在新興的會館建置方面，反倒是無跡可尋。明代徽商還以蓄養家樂對戲曲界造成重大影響，如汪道崑、汪汝謙、汪季玄、吳琨等，其家樂在明代皆頗具聲名，甚至於入清乾隆中葉以後，揚州一帶著名戲班，一半以上是徽商私人家樂。⁴⁶

一、繁華富庶、奢靡成風

商業繁盛背後，自然容易興起一股奢靡風氣。明初，太祖以「吳俗奢僭，欲重繩以法」，使得自唐宋以來的江南奢華之風受到阻礙，然滲入民間底層之文化習俗卻早已根深柢固，無法輕易變更，當朝中政權律令逐漸鬆弛後，固屬當地之民俗風情，反而愈演愈烈。因此，明初樸實無華之社會風尚，在明中葉各地經濟已然復甦的同時，淫靡奢華之習俗亦隨之迅速的漫延開來，張瀚《松窗夢語》卷七〈風俗〉云：

⁴⁴ 朱萬曙：《徽州戲曲》，頁 277-278。

⁴⁵ 清·趙吉士：《寄園寄所寄》，收錄於《續修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冊 1197，頁 127。

⁴⁶ 姚邦藻主編：《徽州學概論》，頁 278。

今兩都，若神京侈靡極矣，金陵值太祖更始，猶有儉樸之遺。至於諸省會，余所歷覽，率質陋無華，甚至織嗇貧窶，即藜藿不充，何暇致飾以炫耳目？吾杭終有宋餘風，迨今侈靡日甚。⁴⁷

杭州一地，早自宋代便相習奢靡。經濟帶來了豐厚的生活，除了飲宴風氣華奢之外，對於住宅房舍建置，亦富麗堂皇，顧起元《客座贅語》卷七引王丹丘之〈建業風俗記〉云：

正、嘉以前之龐厚，而傷後之漸澆薄也。……嘉靖十年以前，富厚之家，多謹禮法，居室不敢淫，飲食不敢過。後遂肆然無忌，服飾器用，宮室車馬，僭擬不可言。……嘉靖末年，士大夫家不必言，至於百姓有三間客廳費千金者，金碧輝煌，高聳過倍，往往重檐獸脊如官衙然，園囿僭擬公侯。下至勾欄之中，亦多畫屋矣。⁴⁸

江南淫靡之風顯然已無視於律令之存在，而奢侈風尚亦遍及各個階層，甚而勾欄內，亦有畫屋。而杭州一地亦「踵事奢華，增構室宇園亭，窮極壯麗。」⁴⁹在對於屋舍華麗之追求下，明代亭園藝術則成爲了另一項奢華代表，並成爲明代新興之歌舞場所。沈德符稱：「嘉靖末年，海內宴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園亭。教歌舞之隙，間及古玩。」⁵⁰其間，士大夫可說是明代奢華風氣的主要代表。

顧起元於《客座贅語·卷一·正嘉以前純厚》中詳細指出：

正、嘉以前，南都風尚最為醇厚。薦紳以文章政事，行誼氣節為常，求田問舍之事少，而營聲利、蓄伎樂者，百不一二見之。逢掖以咕嗶帖括、授徒下帷為常，投贄干名之事少，而挾倡優、耽博奕、交關士大夫陳說是非者，百不一二見之。軍民以營生務本、畏官長、守樸陋為常，后飾帝服之事少，而買官鬻爵、服舍亡等、幾與士大夫抗衡者，百不一二見之。婦女以深居不露面、治酒漿、工織紵為常，珠翠綺羅之事少，而擬倡妓、交結媼媪、出入施施無異男子者，百不一二見之。

51

⁴⁷ 明·張翰：《松窗夢語》，收錄於《歷代史料筆記叢刊·元明史料筆記》，頁139。

⁴⁸ 明·顧起元：《客座贅語》，收錄於《歷代史料筆記叢刊·元明史料筆記》，頁169-170。

⁴⁹ 明·張翰：《松窗夢語》，收錄於《歷代史料筆記叢刊·元明史料筆記》，頁140。

⁵⁰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十六·玩具·好事家》，收錄於《歷代史料筆記叢刊·元明史料筆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2月），頁654。

⁵¹ 明·顧起元：《客座贅語》，收錄於《歷代史料筆記叢刊·元明史料筆記》，（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4月）頁25-26。

正德、嘉靖（1506-1566）以前，南都風氣尚為純樸，不論蓄伎樂、擬倡妓、耽博奕等，皆百不一二。正德後，僭越服飾禮制、蓄伎擬娼、買官鬻爵等事已屢見不鮮。《松窗夢語·卷七·風俗紀》亦言：「人情以放蕩為快，世風以侈靡相高，雖踰制犯禁，不知禁也。」⁵²面對世風日漸奢靡，娛樂活動自然亦愈加盛行。嘉隆間之管志道（1536-1608）於《從先維俗議》卷五〈深追先進遺風以垂家訓議〉中，便提出對於宴會為戲奢靡風氣之反駁。

唯今之鼓弄淫曲，搬演戲文，不問貴遊子弟，庠序名流，甘與俳優下賤為伍，群飲酣歌，俾晝作夜，此吳、越間極澆極陋之俗也。而士大夫恬不為怪，以為此魏、晉之遺風耳。豈知遊風煽於外，淫風煽於內，閨門慚德，必從此起，始作俑者，其有惟薄之變乎？愚深有慮於此，則并尊賓之侑觴戲樂而絕之，因戒后崑，匪從別墅宴賓，不得用梨園子弟，端為戲樂誨淫故也。⁵³

面對士大夫樂與俳優為伍，宴會間侑觴戲樂，管志道深感淫靡敗壞之風盛行，因而追慕先進淳樸遺風，立家訓以戒之。宴會上搬演戲曲於明中葉儼然成為必然趨向，不可斷絕，晚明葉夢珠於《閱世編·卷九·宴會》中便有具體描述。

肆筵設席，吳下向來豐盛。……昔年嚴席，非梨園優人必鼓吹合樂，或用相禮者。今若非優伶，則徑用弦索彈唱，不用鼓樂。其迎賓定席則彈唱人以鼓樂從之。若相知雅集，則侑觴之具，一概不用，或挾女妓一、二人，或用狹客一、二人，彈箏度曲，並坐豪飲以盡歡。⁵⁴

彈箏度曲、挾妓以盡歡，已成為晚明時宴會上之活動。崇禎《松江府志》卷七〈風俗·俗變〉亦云：「席必備列方圓，……器用靖窑，殺菜百種，遍陳水陸，選優演劇，金玉犀翠，遞舉行觴。或翻席復設於別所，張華燈，盛火樹，流連達曙。」張燈設華宴，佳餚百種，美酒行觴，選優演劇以盡歡。美酒佳餚，金杯玉器，歌舞演劇，已成為明代宴會中所不可或缺的基本配備。

縱觀明中葉後江南社會形成奢靡之主要因素，依據陳江於《明代中後期的江南社會與社會生活》中指出：

其一、江南的經濟方式及其所維持得較高的生活水平。

⁵² 明·張翰：《松窗夢語》，收錄於《歷代史料筆記叢刊·元明史料筆記》，頁 139。

⁵³ 管志道：《從先維俗議》，收錄於王利器輯錄：《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第三編〈社會輿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 2 月），頁 172。

⁵⁴ 清·葉夢珠：《閱世編》，（臺北：木鐸出版社，1982 年 4 月），頁 193-194。

其二、富商巨賈與縉紳士大夫起了提倡推動的作用。

其三、江南的社會心裡和生活觀念因廷朝的統治政策而出現復雜的變化。⁵⁵

江南繁華的經濟中心，在明代成爲了全國最爲富庶之地，不但商賈雲集、百貨陳列，甚而華麗樓房之建築亦因此而起，其間又以士大夫之推波助瀾爲最。

面對江南一帶之繁華奢靡，身處其中之徽商，自然感受深刻。明代徽商雖然如駱駝一般的刻苦耐勞，但其喜好聲色亦屢見文獻記載。如李維禎所云：「新安高賈賈人飾冠劍，連車騎，博戲馳逐，好氣任俠，作色相矜，後房佳冶曳紈縠，珥金翠，別有名娼選伎，歌房舞衫與金谷絳惟爭勝。」⁵⁶不僅服飾精美，亦選歌徵妓以遊歌舞之境。而汪道昆於《太函集》卷二〈汪長君論最序〉亦云：「新安多大賈，其居鹽策者最豪，入則擊鐘，出則連騎，暇則召客高會，侍越女，擁吳姬，四坐盡歡，夜以繼日。」出入有車騎，閒暇之日則置高會宴客，擁吳姬以盡歡，夜以繼日，其中又以鹽商最爲奢豪。這些徽商爲展現其富華豪奢，附庸風雅，於是便一同加入當時盛行之蓄養家樂行列。

二、相襲成風、家樂自娛

明代中葉後，江南經濟繁盛，商幫組織活躍，是南北商賈爭赴之地、四方商賈群萃之處，同時也是家樂盛行的主要區域，《中國戲曲志·江蘇卷》云：

從嘉靖至清初，士大夫蓄養家班成風，以應酬飲宴，客主俱樂。一般家班皆唱崑腔，亦有兼唱弋陽腔者，由於家班資財豐厚，廣羅人才，班主有即家主，均爲學識淵博的文人雅士，往往自編自導，因而名角雲集，新秀輩出，影響巨大。⁵⁷

在江蘇嘉靖年間（1522-1566），蓄養家樂已在士大夫間相襲成風，家樂成爲士大夫間交遊的重要條件，許多商人在累積一定財富後，爲提高自身社會地位，便加入蓄養家樂行列，其中又以徽商最主。在徽商營運區域中，主要集中於江南一帶，范金民於《明清江南商業的發展》中提到：

⁵⁵ 陳江：《明代中後期的江南社會與社會生活》，（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4月），頁147-154。

⁵⁶ 明·李維禎：《大泌山房集》，收錄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冊153。

⁵⁷ 中國戲曲志編委會：《中國戲曲志·江蘇卷》，（北京：中國 ISBN 中心，1992年12月），頁640。

嘉靖時，阮弼、黃鐘、潘丁洲、江五公、汪季公、許尚質、吳用良、潘壽州、程澧、程次公等人，都在江南從事過大規模販運貿易。休寧胡正言、汪以振，歙縣蔣振民，婺源李延芳等，紛紛雜踏南京。……在蘇州，徽商麇集。……在杭州，明後期從事商業活動最突出的就是徽商。⁵⁸

自明中葉以後，江南各地儼然已成為徽商天下。正是經商之地緣關係，使得徽商在揚州、兩淮、金陵等地定居，不但因此感染士大夫之家樂風氣，且進一步推動了明代戲曲的發展。

明代徽商在致富後，往往選擇一地定居，並以蓄家樂方式附庸風雅，徽商汪宗孝即為顯例。其字景純，本於揚州業鹽，後移往南京，得王孫故宅廢圃，並「擇稚齒曼容，千金百琲者貯之，教以歌舞，盡一時妙選。」⁵⁹可知汪宗孝擁有家樂，吳夢暘與臧懋循都曾看過其家樂演出。臧懋循有《九月十六集夜汪景純宅，同吳允兆、諸德祖諸君子聽妓，因拈庭來顰時韻，賦得四絕》云：

洞戶層軒放不扃，遞將歌妓借人聽。不知餘曲還留幾，但覺霜華飛滿庭。疑到秦家學鳳臺，歌筵四面錦開屏。雖然佳麗無從見，時送香塵隔棟來。傳得當年子夜新，一聲堪動滿筵人。曲中若到傷心處，難道青蛾不自顰。艷質偏宜最豔詞，歡情惟有酒能知。一傾一石應難醉，何必羅襦半解時。⁶⁰

此外，晚明汪汝謙（1577-1655），字明然，安徽歙縣人，後流寓於杭州。其真實身份是兩浙行鹽之徽商，好交遊，喜聲伎。其家有樓船，名曰「不繫園」，亦名為「隨喜庵」，乃其聲色歌舞之所。《春星堂詩集·卷五·遺詩》毛際可序云：「余少時聞武林有汪明然先生，……先生置舫曰『不繫園』，桂楫蘭橈，宏麗特甚。每四方名流至止，必選伎徵歌，連宵達旦。」⁶¹華麗不繫園船舫，成為晚明杭州西湖高士文人雅集之所。黃汝亨曾作有《不繫園約》，其中有「十二宜」與「九忌」，「九忌」乃「殺生、雜賓、作勢軒冕、苛禮、童僕林立、俳優作劇、鼓吹喧填、強借、久借」，從「強借、久借」可知不繫園並非僅汪汝謙可用，因

⁵⁸ 范金民：《明清江南商業的發展》，（江蘇：南京大出版社，1998年8月），頁187。

⁵⁹ 明·李維禎：《大泌山房集·汪景純家傳》卷71，收錄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冊152，頁227。

⁶⁰ 明·臧懋循：《負芑堂詩選》，收錄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冊168，（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6月），頁38。

⁶¹ 《春星堂詩集》，轉引自劉水雲〈明代家樂考〉，《中國文哲研究通訊》13：1=49，（2003年3月），頁109。

此當出借他人時，忌以「俳優作劇」自然就無法強制執行。《陶庵夢憶·卷四·不繫園》即言：

甲戌十月，攜楚生往不繫園看紅葉，至定香橋，客不期而至者八人：南京曾波臣、東陽趙純卿、金壇彭天錫、諸暨陳章侯、行州楊與民、陸九、羅三、女伶陳素芝。余留飲。章侯攜縑素為純卿畫古佛，波臣為純卿寫照，楊與民彈三弦子，羅三唱曲，陸久吹簫。與民復出寸許界尺，據小牖，用北調說《金瓶梅》一劇，使人絕倒。是夜，彭天錫與羅三、與民串本腔戲，妙絕；與楚生、素芝串調腔戲，又復妙絕。

62

在當時以戲曲為主流之環境中，真要制止俳優作戲，自當不易。汪汝謙雖禁止於不繫園上作戲，但自身卻相當喜愛戲曲，曾聘請著名曲師黃問琴與蘇昆生為其家樂教習。《春星堂集·卷五·次兒去粵西》自注云：

昔馮開之司成延黃問琴教習青衣。予因邀傳歌童。自問琴去世，無復此趣，有女史以善歌寄予，久離教師十七其七。忽於新安遇吳友蘇昆生，典型宛然，殆天作之合也。⁶³

不繫園之華麗與規矩，將身為徽商炫耀之心態表露無遺，不但藉此向世人展現豐厚財力，亦表達了附庸風雅之情。

另外有徽商汪季玄家樂，因經商而寓居揚州。其家樂創始於明萬曆三十九年（1611），與當時戲曲理論家潘之恒同鄉，《潘之恒曲話·廣陵散二則》云：

余辛亥促夏，訪李本寧太史於京口，同至廣陵。社友汪季玄招曲師，教吳兒十餘輩。竭其心力，自為按拍協調。舉步發音，一釵橫，一帶場，無不曲盡其致。為余具十日飲，使畢技於前。旦衣披綃衣，抵旅次，乞詩以示指南。余喜吳鄉之有賞音也，欣為之品題。得十三首，以二序冠之。其濃淡煩簡，折衷合度，所未能勝吳歛者一間耳。別之五年，季玄且厭去，以贈范學憲長倩，欲終其愛，以進於技，令得列之班行。余謂似當少勁，恨為得再觀，頗懷斷袖之思，效前魚之泣，追述初咏，標為《廣陵散》以憶之。⁶⁴

⁶² 明·張岱：《陶庵夢憶》，（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7月），頁72。

⁶³ 《春星堂集》，轉引自劉水雲〈明代家樂考〉，頁109。

⁶⁴ 明·潘之恒：《潘之恒曲話》，（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8年8月），頁211。

面對汪季玄五年後厭其家樂而贈予范長白，潘之恒有著無限感觸。汪季玄不僅徒蓄聲伎，更能「按拍協調」，真可謂為審音者，這對以經商為主之安徽人而言，是不常見的，因此獲得潘之恒極力讚賞，認其可與吳歛者相媲美。

最後提及潘之恒好友吳琨家樂。吳琨，字越石，主要活動於徽州。潘之恒對其家樂大力讚揚，《潘之恒曲話·曲派》云：「自黃問琴以下諸人，十年以來，新安好事家多習之。如吾友汪季玄、吳越石，頗知遴選，奏技漸入家境，非能諧吳音，能致吳音而矣。」⁶⁵雖其技尚無吳音水準，但已神似。而在《鸞嘯小品·豔絕十三首》中，即鉅細靡遺描述吳越石家樂之伶人。其序云：「從吳越石水西精舍觀劇，出吳兒十三人，乞品題。各以名作姓，以字作名，以諸孺作字，得詩十絕，以小序冠之。」⁶⁶可知吳琨家樂是完備的，共十三位伶人，且有高水平之演技。《潘之恒曲話·情痴》中進一步記載觀賞吳越石家樂演《牡丹亭》之情狀。

同社吳越石家有歌兒，令演是記，能飄飄忽忽，另翻一局于縹緲之餘，以悽愴於聲調之外。一字不遺，無微不極。既感杜、柳情深，復服湯公為良吏。吳君有逸興，然非二孺莫能寫其形容，非冰生莫能賞其玄暢。⁶⁷

家樂演技精湛，將杜、柳之深情表露無遺，潘之恒繼言之：「臨川筆端，直欲戲弄造化。水田（疑為：水西）豪舉，且將凌轢塵寰，足以鼓吹大雅，品藻藝林矣。」⁶⁸吳越石雖為一介商人，但其對家樂要求嚴格，在當時徽州地區，有著重要影響力。

徽商在明代家樂中扮演著重要地位，包括南京、徽州、杭州、揚州等當時江南商業繁華重鎮，均可見其蹤跡。因其商人心態使然，不但投下大筆資金，組織家樂，裝飾美麗船舫、精舍，聘請名師教習，甚至能「按拍協調」，有著良好的戲曲才能；然其家樂皆以演唱崑曲為主，不但對當時崑腔流播，有著積極的推動作用，並且影響到家鄉徽州戲曲，於明代戲曲聲腔交流上有著重要的貢獻。

三、接待仕紳、交際應酬

在整個明代徽商家樂群體間，又以鹽業為其主要經商類別，如上述之汪季玄、汪宗孝、吳琨等，皆是以鹽商致富。鹽業是明代商幫最易致富之產業，明初開中法，促使晉商由邊防商旅成為國內首屈一指的大商人，而徽商同樣因鹽利而

⁶⁵ 明·潘之恒：《潘之恒曲話》，頁 17。

⁶⁶ 明·潘之恒：《潘之恒曲話》，頁 199。

⁶⁷ 明·潘之恒：《潘之恒曲話》，頁 72。

⁶⁸ 明·潘之恒：《潘之恒曲話》，頁 73。

成爲揚州大賈。受到地利之便，徽商迅速的在揚州取得鹽權，成爲兩淮鹽商之牛耳。而明代兩淮鹽場之地位，可說爲全國鹽場之冠，其賦收已是全國主要的經濟支柱。此外，兩淮、江南一帶亦是明代蓄養家樂的主要區域，而當蓄養家樂在士大夫間相襲成風時，喜好聲色之徽商，亦不免跟隨風氣所趨，加入家樂行列，以附庸風雅。

明代中葉，至兩淮從事鹽業者，以汪、江、洪、潘、鄭、許等姓氏爲多⁶⁹，如汪氏一族，主要聚居於歙縣、休寧一帶。如汪汝謙（1577-1655），字明然，安徽歙縣人，爲兩浙行鹽之徽商，好交遊，喜聲伎。而汪季玄，亦徽州歙縣人，因經商而寓居揚州，自身對於戲曲亦有獨到見解。正所謂「官商勾結」，自古以來之官吏與商人，往往有著密切關聯。而徽商如何在眾商幫間脫穎而出，是值得注意的現象。鹽商爲與鹽官保持良好關係，謀求鹽官青睞，勢必得了解鹽官上層社會之共同語言，乃至於共同興趣，因此蓄養家樂便成爲進入此門道的第一步。

鹽收之經濟效益是豐碩的，因而徽商在以鹽致富後，所追尋的便是提高自身的社會地位。徽商所以能在鹽商中佔有舉足輕重之地位，還因其所具備之「儒賈」特質，亦即前所論述徽商「賈而好儒」之特質。自古以來的文獻之邦、儒家文化，使徽商在成爲巨富後，思尋「商而兼士」之路。而要進入士人階層，除了依靠科舉考試外，明代販賣官位，亦是途徑之一，因此爲與官吏建立良好關係，家樂便成爲重要媒介。此外，與當時文人士大夫間之往來，亦是提升社會地位的方法之一。如汪汝謙之「不繫園」船舫，除了供應自身享樂之外，也爲當地文人雅士提供了聚會之所，且亦間接促進汪汝謙名聲地位之擡升。

在鹽業打滾之徽商，蓄養家樂不僅爲了自娛，更多是爲了政治社會上之目的。不論是爲了謀取更高的經濟效益，抑或是爲了提升社會地位，徽商蓄養家樂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明代戲曲發展，尤其對於聲腔劇種之流播，爲了迎合士大夫之喜好，徽商家樂皆以演唱崑腔爲主，著實成爲崑腔流播的最佳推手。

總之，明代徽商蓄養家樂之心態，可歸納爲四點：

- 一、身處繁華富庶之江南，組織家樂以自娛是徽商重要的休閒活動。
- 二、徽商成爲巨富後，在炫耀心態趨使下，以蓄養家樂做爲展露自身財富，附庸風雅。
- 三、與地方官員、鹽官往來時，爲獲取官吏青睞，謀取更大經濟效益，蓄養家樂以供場上演成爲交際應酬的主要手段。
- 四、深植於徽商心裡的「儒家文化」，促使徽商在經商成功後，開始尋求自身地位之提升，因此在與文人士夫階層往來時，家樂亦成爲重要媒介。

⁶⁹ 張海鵬、王廷元主編：《徽商研究》，頁 156。

伍、徽商與戲曲聲腔之流播

正所謂「商路即戲路」，在商人四處謀生的同時，來自家鄉的習俗與信仰，也伴隨著商人的腳步而輾轉流傳於各地。除了家鄉戲曲隨商人四處流播外，當商人回到故鄉時，亦不免帶回來自外地的聲腔劇種，也因此促使各地聲腔相互融合，進一步產生新的聲腔體系。明代晉商與徽商同時成為江右與江左兩大商幫，足跡遍佈全國各地，其家鄉所屬梆子腔、青陽腔、徽州腔等，亦於南北各地，綻放光芒。

「無徽不成鎮」指出了徽商對於市鎮的重要，其刻苦耐勞之精神，曾被胡適先生喻為「徽駱駝」。這支由山裡走出來的徽駱駝，足跡遍佈四方，所謂「詭為海島，罕而沙漠，足跡幾遍宇內。」⁷⁰「郡邑田少民稠，商賈四出，滇、黔、閩、粵、豫、晉、燕、秦，貿遷無弗至焉；淮、浙、楚、漢，其邇焉者矣。」⁷¹徽商足跡遍佈各地，無論西南之滇黔、東南之閩粵、西北之豫晉燕秦，以及江南淮浙等地，沒有一處不是徽商的足跡。汪道昆《太函集·卷十四·潘次公夫婦九十壽序》中潘侃亦云：「良賈急趨利而善逐時，非轉轂四方不可。」⁷²歙縣《許氏族譜》則載：「徽歙以富雄江左，而富豪大賈往往挾厚貲馳千里，播弄黔首，投機漁利，始可致富。」⁷³均說明了徽賈經商範圍之廣。徽州行商流動方向有二：一是溯長江遠涉楚、蜀、滇、黔的東西流向，二是兩京、江、浙、閩、廣的南北流向。⁷³這些徽州商人在嘉靖、萬曆年間便已行走各地，他們不僅將各地聲腔帶回家鄉，產生自家徽劇，並且進一步將新產生的徽州戲曲傳播至各地。

一、海鹽腔

「徽俗最喜搭臺觀戲」，這句話充份彰顯了徽州一地對於戲曲之狂熱。在徽池雅調未為流行之前，並無主要聲腔足以代表徽州當地戲曲，可見到的只是由徽商所帶回的戲班，如汪道昆（1526-1593）於嘉靖三十九年（1560），帶海鹽戲班回安徽演出，潘之恒《曲話·金鳳翔》中載：

金娘子，字鳳翔。越中海鹽班所合之女旦也。余五歲時從里中汪太守筵上見之。……試一登場，百態輕盈，豔奪人目，余猶記其《香囊》

⁷⁰ 許承堯：《歙事間譚》（下）第 18 冊〈歙風俗禮教考〉，頁 603。

⁷¹ 明·汪道昆：《太函集》卷十四，收錄於《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冊 1346，頁 668。

⁷² 歙縣《許氏族譜》，轉引自張海鵬、王廷元主編：《徽商研究》，頁 3。

⁷³ 唐力行：《明清以來徽州區域社會經濟研究》，頁 142。

之探，《連環》之舞，今未有繼之者。雖童子猶令魂銷，況情熾者乎？
今之為女豔者，無不慕弋陽而下趨之。⁷⁴

在潘之恒五歲時，汪道昆從襄陽知府解任回鄉，帶了越中（明代紹興府）海鹽戲班回鄉演出，班中一位名叫金鳳翔之伶人，美豔動人，演技出眾，當日場上演出《香囊記》與《連環記》，十分出色。此外，萬曆二十八年的徽州東郊迎春賽會，搭建戲臺三十六座，其中登臺演出者，亦多為吳、越請來的戲班。潘之恒並稱其為「從來迎春之盛，海內無匹，即新安亦僅見之。」正是徽商對於戲曲充滿熱忱，才促使徽州戲曲興盛，帶動徽劇潮流。

二、崑山腔

徽商所蓄養之家樂，著實為明代崑腔之流播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如上所述，不論是居住南京之汪宗孝、流寓杭州之汪汝謙（1577-1655）、寓居揚州之汪季玄（家樂創於萬曆三十九年 1611），乃至於活動於徽州之吳琨，主要皆活動於萬曆年間，而其樂家演出均以崑腔為主，帶動了明代各地崑腔演出潮流，同屬徽州商人子弟潘之恒於《曲話》云：

自黃問琴以下諸人，十年以來，新安好事家多習之。如吾友汪季玄、吳越石，頗知遴選，奏技漸入佳境，非能諧吳音，能致吳音而矣。⁷⁵

點出了徽商家樂崇尚崑腔之風氣。然而徽商家樂以崑腔為主，一方面是受到地緣因素，徽商主要存在於江南之氛圍中，而明代江南吳中一帶又以崑腔為主，因此徽商很自然的以此為習唱對象；另一方面則是徽商為了提高自身社會地位，因此以崑腔家樂作為交際應酬之主要手段。

徽商勢力，無遠弗屆，凡是徽商所到之處，均可見其對於戲曲之支持與貢獻，如侯方域在《壯悔堂文集·卷五·馬伶傳》中所云：

馬伶者，金陵梨園部也。金陵為明之留都，社稷百官皆在，而又當太平盛時，人易為樂，……梨園以技鳴者，無論數十輩，而其最著者二：曰興化部，曰華林部。一日新安賈合兩部為大會，遍徵金陵之貴客文人，與夫妖姬靜女，莫不畢集。⁷⁶

⁷⁴ 明·潘之恒：《潘之恒曲話》，頁 145。

⁷⁵ 明·潘之恒：《潘之恒曲話》，頁 17。

⁷⁶ 明·侯方域：《壯悔堂文集》，收錄於《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冊 51，（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 1 月），頁 510。

新安賈即徽商，能合興化與華林二部，當時最著名之戲班同臺較勁，自應花費不少錢財，當時馬伶演《鳴鳳記》敗給華林部李伶，三年後回到南京，請徽商再開戲宴，召集前次大會賓客，一雪前恥。明代商人請戲班演戲，出手闊綽，常令人咋舌，而兩次宴客皆由新安賈徽商出資，可見商賈對職業戲班的貢獻。馮夢禎《快雪堂日記》卷五十九，萬曆壬寅（1602）九月二十五日條記載：

吳徽州班演《義俠記》，旦張三者，新自粵中回，絕伎也。⁷⁷

於同月二十七日再次觀賞：

吳伎以吳徽州班為上，班中又以旦張三為上。今日易他班更覺損色。

78

班中名旦張三，本為申時行家樂中之伶人，後至吳徽州班搭班演出，其戲班主要演唱崑腔。關於吳徽州班，就名稱而言，應與徽州有某種程度上的關聯，有可能是由徽州人至吳地所組之戲班，抑或者由徽商所贊助之戲班。明代徽商對於戲曲之喜愛，充份表現在對於家鄉戲曲演出之熱衷，以及對於職業戲班的支持。

三、徽池雅調—青陽腔與徽州腔

徽州聲腔主要以青陽腔及徽州腔為主，二者均受到江西弋陽腔而產生。明代中葉，餘姚腔和弋陽腔先後由東鄰浙江和南方江西傳入徽州府及池州府的青陽、石埭等地。成書於明嘉靖己未年的徐渭《南詞敘錄》（1559）中云：「稱『餘姚腔』者，出於會稽、常、潤、池、太、揚、徐用之。」⁷⁹其中「池州、太平」皆在安徽省境內；而魏良輔在《南詞引正》中亦云：「自徽州、江西、福建，俱作弋陽腔。」⁸⁰指出徽州、福建、江西一帶，均屬弋陽聲腔範圍。明中葉，池州府青陽縣一帶融合弋陽與餘姚二聲腔，因而產生了青陽新腔。湯顯祖於〈宜黃縣戲

⁷⁷ 明·馮夢禎：《快雪堂日記》，《快雪堂集》卷 59，收錄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冊 165，（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年），頁 58。

⁷⁸ 明·馮夢禎：《快雪堂日記》，《快雪堂集》卷 59，收錄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冊 165，頁 58。

⁷⁹ 明·徐渭：《南詞敘錄》，收錄於《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三冊，（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 年 7 月），頁 243。

⁸⁰ 明·魏良輔：《南詞引正》，見路工《訪書聞見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頁 239。

神清源師廟記》中，明確指出：「至嘉靖而弋陽之調絕，變為樂平，為徽、青陽。」⁸¹雖其所言「弋陽之調絕」有待商榷，但可知在嘉靖時期，弋陽腔於徽州當地已轉變產生樂平、徽州、青陽等新式聲腔，並且進而回傳至江西。王驥德於《曲律·卷二·論腔調第十》（於萬曆三十八年自序）就提到：

數十年來，又有弋陽、義烏、青陽、徽州、樂平諸腔之出。今則石台、太平梨園，幾遍天下，蘇州不能與角十之三二。⁸²

當明中葉青陽、徽州、太平等腔正式形成後，於稍晚的萬曆時期，便已快速的流傳各地，此與徽商足跡遍佈宇內，有著密切關聯。

首先就青陽腔而言，青陽縣明代隸屬池州府，因此青陽腔亦稱為池州調。池州地處於皖南一帶，主要臨靠長江與江西九江互通，張翰《松窗夢語·商賈紀》中便載：

江西三面距山，背沿江、漢，實為吳、楚、閩、越之交，古南昌為都會。……九江據上流，人趨市利。⁸³

由此可推知當初弋陽聲腔，便是經由此道進入池州當地，而九江本身就屬於江西商業城鎮，因此當青陽腔形成後，很快的便藉由徽賈之經商路線回傳至江西。明代徽商主要往來於江西之間經營景德鎮之瓷窑原料，當初極有可能是徽商買賣時，將江西弋陽聲腔帶回徽州本地。關於江西青陽腔的資料，龔國光於《江西戲曲文化史》中有明確考證，主要依據傅子芸先生於日本所發現的青陽腔散齣總集《詞林一枝》、《八能奏錦》、《玉谷調簧》，以及現今當地所存留之選本比對，推論出：「自青陽腔在安徽青陽產生之後，很快即在皖南、贛東北形成了兩個青陽腔演劇中心。」⁸⁴可知當青陽腔於安徽腔青陽一地生發後，便迅速傳播各地，而其背後功臣，則不得不歸於徽商。

臨近江西之福建，亦於隆慶年間（1567-1572）有了青陽腔的蹤跡。因為萬曆元年（1573）時，閩建書商林葉志已刻成《新刻板青陽時調詞林一枝》，將時調青陽腔刊刻成書，表明當時青陽腔已深受民間喜愛，而風行天下。而另一本同樣於萬曆年間所出版的《新刻京板青陽腔時調詞林一枝》，裡面則包含有「京傳」的青陽腔調數折，可知，至遲於萬曆年間，青陽腔亦已流傳於北京。進一步考察明代徽商在福建與京城之勢力，東南自來便是經濟發達的主要地區，包括浙江、

⁸¹ 明·湯顯祖：《湯顯祖集》卷34，（臺北：洪氏出版社，1975年3月），頁1128。

⁸² 明·王驥德：《曲律》，（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9月），頁104。

⁸³ 明·張翰：《松窗夢語》，收錄於《歷代史料筆記叢刊·元明史料筆記》，頁84。

⁸⁴ 龔國光：《江西戲曲文化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頁95。

福建沿海一帶，均可見徽商的蹤跡。然而浙、閩一帶最大問題即是倭寇海盜為患，對於徽州海商而言，可說是一大阻礙，也因此徽商肩負起了抵抗倭寇的任務，明代大學士許國曾經說過：「曩東南諸郡，繕兵築城，所籍客戶，十九皆徽。」可知徽商於浙、閩一帶之勢力是強盛的。明人徽州學者金聲亦指出：「盡天下通都大邑及窮荒絕徼，乃至外薄戎夷蠻貊，海外貢朔不通之地，吾鄉人足跡或無不到。」在嘉、隆（1522-1566）時期，閩、浙一帶以歙縣與休寧商人居多，《閩書·卷三十八·風俗》云：「安平一鎮盡海頭，經商行賈，力於徽、歙，入海而貿易，差強資用。」⁸⁵於泉州安平一帶，已有眾多的徽州與歙縣商人。不論是徽州、歙縣還是休寧，皆位於皖南黃山一帶，臨近池州，因此在戲曲聲腔範圍上，多少有受到青陽腔的影響，所以當其進入閩、浙行商時，很自然地將聲腔攜入當地。

至於徽商在京的勢力，隨著徽商早期因開中法而至邊防運販米糧換取鹽引時，其商路亦已深入北方。據清初趙吉士言：「徽之富民，盡家於儀、揚、蘇、松、淮安、蕪湖諸郡以及江西之南昌、湖廣之漢口，遠如北京亦復挈其家屬而去。」因此當徽商進入北京時，產生於徽州的新式聲腔體系，亦隨之而來。臨近北京之山西，在萬曆年間亦見有青陽腔之蹤跡，馮俊杰在探究明萬曆年間山西《禮節傳簿》手抄本時，推測：

我認為《傳簿》中的《安安送米》、《蘆林相會》和《三元捷報》，就出自青陽腔《湧泉記》和《三元記》。……此簿應成書於嘉靖十三年左右，……當時正是青陽腔最活躍的時代。⁸⁶

倘若如同上述所言嘉靖年間青陽腔已傳至山西一帶，則青陽腔之形成年代，就必需上推至嘉靖以前。山西流傳青陽腔，有可能是徽商流傳至山西，但也極有可能是山西商人外出經商而帶回家鄉的，在未有更多資料佐證下，僅能以存疑態度視之。

此外，蘇州、揚州一帶是明代商業的經濟重心，同時也是徽商聚集之處。王世貞於〈送吳令湄陽傳君入覲序〉中云：

今天下之稱繁雄郡者，毋若吾郡；而稱其繁雄邑者，亦莫若吾邑。吳固東南大郡會也，亡論財賦之所出，與百技淫巧之所湊集，駟僮講張之所倚窟。⁸⁷

⁸⁵ 明·何喬遠：《閩書》，收錄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冊 204，（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 年），頁 717。

⁸⁶ 馮俊杰：《戲劇與考古》，（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2 年 1 月），頁 29。

⁸⁷ 明·王世貞：《弇州山人續稿選》卷二十八，（臺北：文海出版社，1970 年），頁 1664-1665。

蘇州不僅是商業集散地，也是百技匯集生存之區域。許多徽商爲了營運長途販賣商業，往往以蘇州爲重要的起落點，如成化、弘治年間休寧商人查大道，「嘗客吳楚間，貨殖多中。中歲，業益殷。」⁸⁸因此青陽腔亦曾一度來到此地。在《呂真人黃梁夢境記》第九齣〈夢蝶〉云：「吳下人曾說，若是拿著強盜，不要把刑具拷問，只唱一台青陽腔戲與他看，他就直直招了。蓋吳下人最怕這樣的曲兒。」⁸⁹在吳中地區，青陽腔的敲鑼打鼓自是無法與流麗悠遠的崑山腔相比，但隨著徽商大量的聚集，真要完全隔絕青陽腔，是不可能的。張岱於《陶庵夢憶》卷六〈目連戲〉中就記載了徽州青陽戲班的演出。

余蘊叔演武場搭一大戲臺，選徽州旌陽戲子，剽輕精悍，能相撲跌打者三四十人，搬演目連戲，凡三日三夜。四圍女臺百什座。戲子獻技臺上，如度索舞絙、翻桌翻梯、舢斗蜻蜓、蹬壇蹬白、跳索跳圈、竄火竄劍之類，大非情理。⁹⁰

旌陽，可能是青陽之訛誤。這場目連武戲，演了三天三夜，有各式各樣的雜技穿插其中，熱鬧非凡。可知吳中一帶，還是有青陽腔的存在。另外，地處吳地北方之山東柳子戲，也受到了青陽腔的影響，⁹¹而山東亦爲徽商營運範圍，如嘉靖時歙人黃元芳，「往來荆吳齊魯徐梁之區，足迹殆遍。」⁹²可見徽商在往東至吳地經商的同時，亦涉足至北邊山東行商，因而影響了山東柳子戲。

至於湖廣地區，於萬曆年間亦可見青陽腔。湖南的龍膺，曾於萬曆八年至十四年（1580-1586）任職於徽州府推官，在觀賞過青陽腔之演出後，寫下了《詩謔》一詩加以嘲謔：

彌空冰霰似篩糠，雜劇尊前笑滿堂。梁伯旋風深臉漢，殺沱臘雪咬臍郎。斷機節烈情無賴，投筆英雄意何傷。何物最娛庸俗耳，敲鑼打鼓鬧青陽。⁹³

⁸⁸ 《休寧西門查氏祠記》，轉引自張海鵬、王廷元主編：《徽商研究》，頁 95。

⁸⁹ 《呂真人黃梁夢境記》，收錄於《全明傳奇》，（臺北：天一出版社，1985 年）。無頁碼。

⁹⁰ 明·張岱：《陶庵夢憶》，頁 123。

⁹¹ 流沙：《明代南戲聲腔源流考辨》柒〈徽池雅調淺談〉，（臺北：財團法人施合鄭民俗文化基金會，1999 年 5 月），頁 181。「山東應是青陽腔最早流行的區域。」

⁹² 歙縣《潭渡黃氏族譜》卷 9，轉引自張海鵬、王廷元主編：《徽商研究》，頁 95。

⁹³ 明·龍膺：《九芝集》卷 22，轉引自廖奔：《中國戲曲聲腔源流史》，（臺北：貫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2 年 7 月），頁 81。

龍膺，認為青陽腔只不過是取悅市井孌童之腔調，實為庸俗之物，無足可觀。⁹⁴與其相對之湖北，則有袁宏道於萬曆二十七年（1599）從北京寫信給江陵友人沈胡煥之書信，云：

南郡地暖，以使君之尊臨之，如居第六天中，然在兄丈亦有小苦，……
歌兒皆青陽過江，字眼既訛，音復乾硬，三苦也。⁹⁵

青陽腔隨著長江水系、徽商腳步，進入了湖廣地域，並且曾經在江陵一帶極為盛行，正是「歌兒皆青陽過江」。此外，於萬曆三十一年（1605），亦寫了一首《竹枝詞》：「一片春煙剪穀羅，吳聲軟眉似吳娥，楚妃不解調吳肉，硬字乾音信口吡。」⁹⁶說明當日於楚地所聽之青陽腔，在行腔演唱上已帶有湖北當地語言之特色。⁹⁷文中除了指出青陽腔流傳迅速之外，另一方面則點出青陽腔旺盛的適應能力。雖然上述二者皆以文人角度鄙薄青陽腔，但也反映了明代青陽腔在各地流行之情況，正如李維禎所言：

數十年間，不知何出有青陽調佈滿天下。衣冠之會，翰墨之場，俳優侏儒雜誌。其俗惡，使人掩耳。穢而逐臭，嗜痂之夫，顧溺而不返。

李維禎同樣以文人身份表明對青陽腔之鄙視，聽之使人掩耳，乃「穢而逐臭，嗜痂之夫」，鄉村野婦所喜之物。

明代文人雖一再表達出對於青陽腔之厭惡，但也由此證明晚明時期青陽腔已然成為全國最為風行之聲腔劇種。可知自嘉靖、萬曆年間所產生之青陽腔，其流播速度之快，範圍之廣，著實讓人望塵莫及，然此皆導源於明代徽商足跡遍佈天下之緣故。

其次就徽州腔而言，產生於現今安徽省南部歙縣一帶。徽州腔之形成主要也受到了弋陽腔的影響，產生後與青陽腔一樣迅速的進入到江西地域。徽州腔在萬曆年間開始向外大力發展，因主要採取的是官話，與青陽腔的地方用語不同，所以二者在發展上相輔相成，各自有流行的地域而不會相互衝突。徽州臨近歙縣，於萬曆年間有徽歙所出版的《新刊徽板合像滾調樂府官腔摘錦奇音》單刻本，而

⁹⁴ 明·龍膺：《九芝集》卷 21。「抑且專尚蠻俗諧謔，勾肆打油之語，櫛□砌湊為詞，如青陽等腔，徒取悅於市井孌童遊女之耳。置之几案，殊污人目，是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

⁹⁵ 明·袁宏道：《袁中郎全集·尺牘》卷 23〈與沈伯函水部〉，收錄於《明代論著叢刊第二輯》，（臺北：偉文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76 年 5 月），頁 1090-1091。

⁹⁶ 明·袁宏道：【竹枝詞】其十一，收錄於《歷代竹枝詞》甲編，（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3 年 12 月），頁 256。

⁹⁷ 周顯寶：〈論青陽腔的人文背景、歷史地位及美學價值〉中，《音樂藝術》第 4 期（1997 年），頁 12。

當徽州腔流傳至福建時，則出現了與青陽腔的合刊本。⁹⁸合刊本的出現，指出了徽州與青陽二腔在福建之流行，此亦因徽商在福建有龐大之勢力所造成。從現存資料來看，關於徽州腔在明代的流播地域，尙未能如實的架構出來，然而依據徽商在明代「賈人幾遍天下」的形勢，徽州所屬聲腔必定也於天下廣為流行，否則就不會有清代徽池雅調之繁盛景象了。

最後，附帶說明徽州對於戲曲的另一個貢獻，即版畫的刊刻。因宗族觀念強盛，促使徽商不惜斥資鑄刻精良族譜，更進而從中刻印了大量通俗小說與戲曲本子。謝肇淛於《五雜俎》卷十三提到：

宋時刻本以杭州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今杭刻不足稱矣！金陵、新安、吳興三地，剞劂之精者，不下宋板。楚、蜀之刻皆尋常耳，閩建陽有書坊，出書最多，而板紙俱最濫惡。⁹⁹

新安刻書在明代刻板行業是數一數二的，如高石山房鄭之珍所編刻的《目蓮救母勸善戲文》，對於徽劇、漢劇、川劇、婺劇、崑劇等劇種，都產生過重要的影響。尤其晚明大量精麗動人的徽版圖書，不但增加讀者閱讀趣味與理解，更發展了中國版畫藝術，存留許多珍貴的戲曲演出資料。

徽州各地新式聲腔產生後，在萬曆年間迅速的風靡各地，流佈於安徽、江西、浙江、閩粵、湖廣、四川、山東、山西等地，比弋陽腔之流傳有過之而無不及，與徽州商人足跡遍佈宇內，可說是相輔相成，同時進行的。直到清代，更取代了崑山腔，而贏得「天下南北時尚徽池雅調」之美稱。總之，徽商對於明代戲曲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不論是戲曲上聲腔劇種的流播與交融，或者戲曲文物書籍之刊刻流傳，都顯示了做為明代第一商幫應有的氣度與影響力。

陸、結語

明代的繁華商業，帶動中國商幫體制的出現，其中又以徽商與晉商為代表。強大的商幫勢力，無所不入地遊走於大江南北，乃至於海外貿易，均可見其蹤跡。而就在商幫足跡遍佈全國的同時，也為明代各地的風俗文化帶來不斷地交流、融合與變異。

在人稠糧缺情況下，徽州人民不得不外出經商，順著地利之便，徽州商人很快取得了兩淮鹽權，成為全國最大鹽商，雄霸江南。以鹽致富之徽商，很快地賺

⁹⁸ 廖奔：《中國戲曲聲腔源流史》，頁 77-78。「閩建書商林熊稔襄匯集的《精選天下時尚南北徽池雅調》，一為閩建書商林拱塘金魁綉梓的《鼎鑿徽池雅調南北官腔樂府點板曲響大明春（又署為「萬曲明春」、「萬曲長春」）。從後兩種選本系由當時福建書林人物編選和刊刻來看，至手徽州腔已在福建流行，這樣書坊才能獲利。」

⁹⁹ 明·謝肇淛：《五雜俎》，收錄於《續修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冊 1130，頁 608。

取了大量財富，並養成奢華之習性。徽商富而奢華之性格，每每於外地興建華麗園林居住，並廣蓄聲伎家樂，以作為登仕途之徑，充分展現賈而好儒之特質；此外，明代未見徽商會館，主因在於受到徽州宗族制度影響，徽商於外地經商成功後，往往於當地建置宗族祠堂，以作為鄉人在外之精神處所，與晉商是有所差別的。

所謂「商路即戲路」，明代繁盛的各地聲腔，正是隨著商人足跡而得以傳唱各地。明代徽州以青陽腔及徽州腔為代表。受到弋陽腔而產生的徽池雅調，隨著徽商足跡而輾轉流傳各地，不論是鄰近之江西、江南一帶，更北至方山西、北京，南達湖廣各地，在明代晚期大放異彩，而此皆歸功於徽商的營運腳步。徽商之魅力延燒，至清代更為火熱，徽池雅調之盛行，不僅豐富了中國戲曲世界，更見證了徽州商人的雄厚勢力及其對於戲曲之貢獻。

參考文獻

古籍

- 《呂真人黃梁夢境記》，收錄於《全明傳奇》，臺北：天一出版社，1985年。
- 《萬曆歙縣志》，明萬曆三十七年刊本。
- 《道光徽州府志》，收錄於《中國地方志集成》冊235，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
- 明·于慎行，穀山筆塵，收錄於《歷代史料筆記叢刊·元明史料筆記》，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6月。
- 明·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收錄於《明代論著叢刊》，臺北：偉文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76年5月。
- 明·王世貞，弇州山人續稿選，臺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
- 明·王陽明，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 明·王遂，青城山人集，收錄於《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冊176，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年。
- 明·王驥德，曲律，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9月。
- 明·何喬遠，閩書，收錄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冊204，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
- 明·李夢陽，空同集·明故王文顯墓志銘，收錄於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八集，臺北：商務印書館，1974年。
- 明·李維禎，大泌山房集，收錄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冊153，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6月。
-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收錄於《歷代史料筆記叢刊·元明史料筆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2月。
- 明·汪道昆，太函集，合肥：黃山書社，2004年12月。
- 明·侯方域，壯悔堂文集，收錄於《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冊51，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1月。
- 明·計六奇，明季北略，收錄於王雲五編：《人人文庫》，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5月。
- 明·徐渭，南詞敘錄，收錄於《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三冊，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年7月。
- 明·袁宏道，袁中郎全集，收錄於《明代論著叢刊第二輯》，臺北：偉文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76年5月。

- 明·張居正，張文忠公全集，收錄於王雲五編《國學基本叢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68 年 12 月。
- 明·張岱，陶庵夢憶，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 年 7 月。
- 明·張翰，松窗夢語，收錄於《歷代史料筆記叢刊·元明史料筆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 5 月。
- 明·陳洪謨，治世餘聞，收錄於《歷代史料筆記叢刊·元明史料筆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 5 月。
- 明·陳洪謨，繼世紀聞，收錄於《歷代史料筆記叢刊·元明史料筆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 5 月。
- 明·湯顯祖，湯顯祖集，臺北：洪氏出版社，1975 年 3 月。
- 明·馮夢禎，快雪堂日記，收錄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冊 165，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年。
- 明·楊洵，萬曆揚州府志，收錄於清·陳夢雷編：《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 760〈揚州府部風俗考〉，臺北：鼎文書局。
- 明·臧懋循，負苞堂詩選，收錄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冊 168，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年 6 月。
- 明·潘之恒，潘之恒曲話，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8 年 8 月。
- 明·謝肇淛，五雜俎，收錄於《續修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冊 113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 明·魏良輔，南詞引正，見路工《訪書聞見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
- 明·顧起元，客座贅語，收錄於《歷代史料筆記叢刊·元明史料筆記》，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 4 月。
- 清·葉夢珠，閎世編，臺北：木鐸出版社，1982 年 4 月。
- 清·趙吉士，寄園寄所寄，收錄於《續修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冊 119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二、專書

- 中國戲曲志編委會，中國戲曲卷·江蘇卷，北京：中國 ISBN 中心，1992 年 12 月。
- 姚邦藻，徽州學概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年 12 月。
- 流沙，明代南戲聲腔源流考辨，臺北：財團法人施合鄭民俗文化基金會，1999 年 5 月。
- 范金民，明清江南商業的發展，江蘇：南京大出版社，1998 年 8 月。

唐力行，明清以來徽州區域社會經濟研究，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1999年8月。

張海鵬、王廷元，徽商研究，合肥：安徽出版社，1995年12月。

許承堯，歙事閒譚，合肥：黃山書社，2001年5月。

陳江，明代中後期的江南社會與社會生活，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4月。

馮俊杰，戲劇與考古，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2年1月。

黃鑿暉，明清山西商人研究，太原：山西經濟出版社，2002年6月。

廖奔，中國戲曲聲腔源流史，臺北：貫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2年7月。

管志道，從先維俗議，收錄於王利器輯錄：《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2月。

劉建生、劉鵬生，晉商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

龔國光，江西戲曲文化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

A Research of the Hui-Chou Businessman and Drama in Ming Dynasty

*Hsiang-Chun Ko**

Abstract

It is Hui-Chou businessman in the Ming Dynasty that this text probes into the target. Make use of the economic benefits brought, amusement orientation, culture background by Hui-Chou businessman. Understand that the Hui-Chou businessman is to the important influence that the opera produced in Ming Dynasty. The Hui-Chou businessman has not merely promoted the opera activity, have become the best persons who spread of operatic tunes of opera even more.

Keywords: Hui-Chou Businessman ; Family Troupes ; Qingyang opera ; Hui-Chou opera.

* Lectur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Soochow University